

◀（上接2版）

中国共产党的成立，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。十月革命胜利，五四运动爆发，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认清了西方公理的强权本质，决心走俄国人的路。创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，与中国工人运动实践相结合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已如箭在弦上。1920年冬春之际，“南陈北李，相约建党”。陈独秀来到上海，团结一批初具共产主义理想的进步分子，积极投身马克思主义结合工人运动的实践活动。这时，共产国际代表的到来，虽非第一推动力但确实加快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步伐。1921年6月，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成立，当时名为“社会共产党”，对于党的名称是否合适，陈独秀与李大钊等积极商讨，于8月定名为“共产党”。李大钊的意见显然是接受了共产国际“二大”的有关规定，列宁



1920年，《共产党宣言》中文全译本第一版问世。由于排版疏忽，封面书名《共产党宣言》错印成了《共党产宣言》。

坚决抛弃第二国际，“社会”党的旗号实已落伍，张扬“共产党”必须旗帜鲜明。

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各种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中脱颖而出，科学社会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势在必行。马克思、恩格斯共同起草的《共产党宣言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享有盛誉，理应在传译方面先行一步。从19世纪末到1920年前，《共产党宣言》在中国已有详略不一的各类摘译。1919年4月，陈独秀主编的《每周评论》第16期发表“舍”的署名文章，高度评介《共产党宣言》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”[刘子照：《〈共产党宣言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研究（1899—1921）》，广西师范大学2014届硕士学位论文]，这对陈独秀后来支持该文献的翻译出版当有

积极意义。如此看法在当时倾向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渐成共识，上海的星期评论社邀请陈望道翻译《共产党宣言》，戴季陶为此提供该书的日译版。但当陈望道完成《共产党宣言》全书的翻译，1920年4月到沪，《星期评论》不久被迫停刊，这使得《共产党宣言》中文全译本的出版面临流产的危险。陈独秀邀请陈望道参加《新青年》编辑工作，并与李汉俊等采用英、俄、日译本进行译校，还成立又新印刷所，最终促成《共产党宣言》作为“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”第一种，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于同年8月顺利出版，9月又出了第二版。

《共产党宣言》中文全译本的问世，本身就是中共发起组积极作为的有机组成，其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产生了积极的作用。主要有三：

一是促进各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学习认识。在李大钊的主导下，北京大学图书馆购入了德文版《共产党宣言》，上海译校用的英文版《共产党宣言》就是借自北大（邓明以：《〈共产党宣言〉是怎样传播到中国来的》，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：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》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）。北京早期党组织成员罗章龙有翻译德文本《共产党宣言》之说[罗章龙：《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》，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、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：《一大前后》（二）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]，但是上海既出中译本，当然更具权威性，阅读也更为便捷，1922年2月6日《北京大学日刊》所载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》显示，其中既有英文版《共产党宣言》，又有陈望道译的《共产党宣言》，其采购以飨读者的时间理应更早。此外，长沙、济南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也均有学习研究《共产党宣言》的记述[刘子照：《〈共产党宣言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研究（1899—1921）》]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早期党组织的建立团结了真同志，厚培了理论基础。

其二，增强早期共产党人理论能力，同非马克思主义划清界线。《共产党宣言》第三章《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》将1840年代流行的各类社会主义思潮分为反动的社会主义、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，以及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三大类，逐一抨掊，真伪立现，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理论性。如此

批判精神对于早期共产党人明辨是非、认清敌友，极具理论价值。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发生的三次论战，早期共产党人所以能够严正对待、有效批驳，主要得益于包括《共产党宣言》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。特别是同样打着“共产主义”旗号的无政府主义者，时以更“左”的面目示人，公然抨击科学社会主义，尤须加以辩驳。1919年5月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所作《马克思学说批判》攻击无产阶级专政，在《新青年》第6卷第5号发表。1920年1月，无政府主义的《奋斗》杂志又发表《我们反对布尔什维克》等文章。《新潮》第2卷第3号刊载《无强权主义的根据及无强权的社会略说》，系统地宣扬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（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：《中国共产党上海史（1920—1949）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）。共产主义者起初有意团结无政府主义者，同创共产党早期组织，但随着形势的发展，二者分道扬镳已属必然之事。反击无政府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挑战，是摆在共产党人面前必须应对的难题。在这种情形下，中共发起组发起对无政府主义的论战，表现出相当的勇气，受《共产党宣言》的感召当有助于理论自信。区分科学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真伪，极有利于共产党早期组织建设及时排除无政府主义者的困扰。

其三，促进中共发起组起草《中国共产党宣言》，成为入党标准。前有民初政党发表宣言宣告成立的通行做法，近有《共产党宣言》的规范可循，中国共产党起草并发布宣言势在必行。据张国焘的回忆，陈独秀在1920年夏尚无急迫发表宣言的冲动，陈说：“我们不必做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，一开始就发表一个《共产党宣言》；我们只是要做边学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，现在可以先将共产党组织起来，党纲和政纲留待正式成立以后再去决定”[《张国焘回忆中国共产党“一大”前后》，《一大前后》（二）]。但当中国共产党定名，各地早期党组织纷起成立，形势发展需要中共发起组尽快制定纲领、宣言。1920年11月7日，党的第一份理论刊物《共产党》有意识地选择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创刊，陈独秀撰写的刊首《短言》宣称：“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，打倒一切资产阶级”，“一切政权归劳动者执掌”，所揭橥党的政纲主张，与同月中共发起组制定的《中国共产党宣言》一致，毛泽

东盛赞该刊“旗帜鲜明”。《中国共产党宣言》分为共产主义者的理想、共产主义的目的、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三部分，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纲领性文献《共产党宣言》的核心思想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指导思想——列宁主义的核心思想结合在一起（高放：《从〈共产党宣言〉到〈中国共产党宣言〉——兼考证〈中国共产党宣言〉的作者和译者》，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》2011年第3期），《共产党宣言》在其中所起作用自不待言。《中国共产党宣言》虽未公开发表，但在各地早期党组织内流传，“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”[《中国共产党宣言》，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、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：《一大前后》（一）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]，发挥了历史作用。

中共一大因故没能发表《中国共产党宣言》，中共二大弥补这一历史缺憾

产生于1920年底的《中国共产党宣言》，没能成为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宣言书，并不全然是憾事。因为按照民主集中制的马列主义建党原则，特别是共产国际“二大”的有关规定，“必须召集党的特别代表大会”，就“正式加入共产国际”作出议决（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》编辑委员会编译：《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）。《中国共产党宣言》理应由中共一大来制订与发布。

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，代表们将制定大会宣言作为重要议程。张国焘回忆说：“摆在第一次大会面前的任务：要把各小组联合起来组织一个中央，决定宣言、党纲。”（舍维廖夫：《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》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、中央档案馆编：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》，中央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）张国焘在《我的回忆》中还提到，1921年春“我首先草拟了一个党纲政纲草案，题名为《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》”。并请马林过目[《张国焘回忆中国共产党“一大”前后》，《一大前后》（二）]。中共一大代表李达、张国焘、董必武、陈公博、包惠僧等人对于一大宣言的讨论与制定均有回忆述及，

其中最可信的当是陈公博1924年硕士论文《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》的相关记载，时距中共一大召开仅过去两三年。

陈公博在硕士论文中具体说明了中共一大“未能发表第一个宣言”的原由。张国焘、董必武等在1929年前后的书信或讲稿也认定中共一大没有产生宣言（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》，中央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）。其实，当时大会起草了宣言草案。宣言草案共分两部分，第一部分“描述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，把这种状况的调查研究结果建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《共产党宣言》所阐发的理论基础之上，极力主张进行社会革命的必要性”。后一部分“列举了北方政府和南方政府的罪恶，并说孙逸仙博士的政府并不比北方政府的好”。李达在回忆文章中说“这宣言有千把个字”，“前半大体抄袭《共产党宣言》的语句，我记得第一句是‘一切至今存在过的历史，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’”（陈公博著、韦慕庭编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：《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）。《共产党》月刊刊载过美国统一共产党的宣言《美国共产党宣言》，这篇宣言开篇即引用了《共产党宣言》的一段文字（《美国共产党宣言》，《共产党》第2期，1920年12月），显然中共一大宣言的体例受到了它的影响。李达所述一大宣言草案的主体内容也与陈公博论文所述一致。

宣言草案主体内容的第二部分引起中共一大代表的激烈争论。代表们对北洋政府的态度是一致的，但是他们对南方政府的观点分歧严重。有些代表说，国民党的纲领“暂时还是多少代表了新的趋势。孙博士所提倡的民生主义类似国家社会主义”（《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》）。有的说，共产党的领袖（指陈独秀）“在广州做教育厅长，由此可见南方政府比北方政府进步些。”[李达：《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、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》，《一大前后》（二）]然而，多数代表主张“因为很多国民党员反对共产党，所以南方政府应当推翻”（《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》）。包惠僧对国民党的态度尤为激烈，声称：“孙中山好说大话不择手段，广东的军事独裁致民不聊生……那里还有一点革命的气味呢？况且他是一个代表资产阶级的东西，做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宣言，还能

（下转4版） ➡